

乡土、革命与“大地”的芬芳

——评陶少鸿长篇小说《大地芬芳》

马为华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大地芬芳》是湖南作家陶少鸿背离了潮流性的写作方式而成就的一部大作品。作品抛弃了各种理念的束缚和缠绕,也没有采用过多繁复的技巧,以最接近小说原初本质的方式书写了一系列好看的人生故事;在这些故事的铺陈与展开中,土地与革命,每个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带着他们各自的丰富性甚至是矛盾性,如其所是地存在着,一个坚实的非常富有质感的大地也就在文本中铺展了开来。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当下乡土小说中非常稀缺的乡土风景的描写,这些风景中蕴含的饱满生命气息和宁静动感,构成了坚实大地上流转不息的芬芳,整部小说具有了一种既厚重又灵动的奇妙韵味。

[关键词]陶少鸿;《大地芬芳》;反文化象征体;乡土写作;革命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2)05-0037-04

On Loc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Fragrance of the Earth

——Comments on the novel The Fragrance of the Earth by Tao Shaohong

MA Weihua

(School of Humanity, Guangdong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Fragrance of the Earth, written by a Hunan writer Tao Shaohong, is an outstanding work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popular native writing style. This novel, getting away from kinds of conception bound, did not use complicated techniques but contains a series of attractive stories which close to the original essence of writing. In the process of elaborating the stories, a vivid image of solid land, existing as that the land and the r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different life paths of everyone's with its receptive diversity even contradiction, is shown in the novel. An amount of description of local landscape, which is full of life vitality and the quiet dynamism but scare in current writing, constitute the fluttering fragrance of the solid land in Tao's novel which make the whole novel a kind of special dignified and lithe charming.

Key words: Tao Shaohong ; The Fragrance of the Earth ; anti - culture symbol ; revolution writing native writing

《大地芬芳》是湖南作家陶少鸿的一部长篇力作,这部小说并非一部新作,而是作者在自己十几年前的旧作《梦土》的基础上做了较大修改而形成的一部小说。小说以湖南石蛙溪为主要背景,描画了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因素——土地与革命的种种,这个主题可以说是老调重弹,很难出彩。然而作家陶少鸿凭借其对农村生活细节的谙熟,对人性、人情的洞察以及出色的驾驭小说的能力,使得一部题材上并不新鲜的作品意蕴丰厚,充

满了令人回味思索的韵致与意味。

一 反文化象征体的乡土写作

《大地芬芳》首先是一部非常典型而又具有超越性的乡土小说。说它典型,是因为小说以一个百岁农民陶秉坤一生对土地梦的追求建构了小说的主体。说它具有超越性,是因为《大地芬芳》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20世纪以来所建立的乡土小说传统。

收稿日期: 2012-04-28

作者简介: 马为华(1974-),女,新疆奎屯人,广州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农耕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乡土中国”,乡土小说作品在整个20世纪的长河中数量众多,蔚为壮观。现代文学时期,鲁迅和沈从文以各自的创作构建了乡土写作的两种范式:一种是以启蒙的眼光批判农村的落后凋敝、精神愚昧,在这种范式中,乡土的贫穷、苦难和落后恰恰是中国的象征;沈从文则以满怀着诗意的笔触,抽取时间和空间的具体性,将乡土塑造成了一个人性美好淳朴的诗意乌托邦。进入当代,“十七年文学”中,乡土被国家收编整合,关于乡土的文学叙述高度统一在合作化的政治主题上。20世纪80年代,《人生》当中的高加林所面临的人生困境,是对现代乡土小说两大传统的综合:乡村一方面意味着经济上的贫苦落后没有出路,一方面意味着道德上的淳朴高尚和坚守,这种叙述是自8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叙述中最为强大有力的一支,这两年非常热门的苦难而又温情的底层小说,是高加林传统的华丽变身。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这些乡土小说中的乡土从来都没有具有过本体性的意义。乡土,只是一种工具、渡河之筏或者捕鱼之筌;乡土,只有作为现代性历史启蒙、革命的对象或反现代性的武器时才得以显身,才具有相应的价值。学者贺仲明指出:“乡村或者沦为文化批判的产物,或者成为心灵幻想的寄寓地,破碎、漂移、矛盾、困惑充塞其中,却不能形成完整独立的文学世界”,^[1]无独有偶的是,另一位学者郜元宝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广义的农村题材小说,从来就是自在的农村生活与超越其上的各种形态的先验思想的结合,^[2]“在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中,很难看到自主的乡村面貌和自在的农民形象,也很少能看到持续深入地展示独立乡村姿态的乡土小说作家。乡村和乡村人的面貌在中国乡土小说中始终模糊,也始终没有出现真正展现中国乡土精神的小说大家”。^[1]

《大地芬芳》无意于建立或批判或美化的象征,而是以一个世纪历史的变迁为背景、绵密悠长而又扎实稳健地写出了陶秉坤对土地深厚的感情,以及他的土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命运。说《大地芬芳》是一个农民的生活史,并非过誉之词。以往的乡土小说中,农民也许是文中不折不扣的主人公,却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他们或者是被悬置于时间之外的“超历史”存在,一如《边城》里的翠翠,或者是被历史所批判否定、调侃戏谑的对象,一如阿Q或陈奂生以及赵树理小说中的“小腿疼”“吃不

饱”等,而在小说《大地芬芳》里,虽然并没有回避20世纪历史中有关土地的各种政策的变化:从农会闹土改,到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再到分田到户以及最新的旅游征地、房产开发征地。这些大历史深刻地影响着甚至改写着陶秉坤及其家庭的命运。然而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化,不变的是陶秉坤置地的决心与坚毅。在云波诡谲、风生水起的大历史面前,陶秉坤是那样的身不由己,但却又是那样的不屈不挠,作家在描述陶秉坤时,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动用了另外一种时间形态,这种时间形态就是应和着农耕和土地的时间形态:春种、夏忙、秋收、冬藏,而对于陶秉坤来说,特殊的是,冬天也并不是可以赋闲在家的日子,小说里有很多个冬天,陶秉坤都是带着儿孙在挑土开荒中过去的。

人一忙日子就过得快,眼见得太阳就暖了起来,山上泛起了一片新绿。三月泡红的时候,黄幺姑要生孩子了。^{[3]59}

农历五月初,城里的枪声尚未传到乡下,陶秉坤的日子平静而悠闲。头道茶采了,红薯秧也栽完了,禾苗插下去已经返青,绿生生招人喜欢。手头没有要紧的农活,习惯于从早忙到黑的陶秉坤难得地消停了几天。^{[3]171}

插秧季节临近,陶秉坤戴上斗笠,穿好蓑衣,扛好犁具,牵着牛来到了丁字丘。^{[3]225}

小说中伴随着陶秉坤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和大自然同步一体的时间,似乎周而复始而近乎循环,但是却并不机械。随着陶秉坤儿孙辈的逐渐诞生,一种乡土独有的悠远沉实的气息散发开来。小说中多次深情地写到陶秉坤对孙儿们脖子上的乳香、胯下的尿香的陶醉和迷恋,这其实就是生命延续最温馨的气息,如同一棵开枝散叶的大树一般,农民生活生生不息的力量就在文本中悄无声息地弥漫了开来。外在生活的大历史和陶秉坤农民生涯中小时序的交错,使得整部小说既具有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饱满浑厚,而又不会让人物淹没于大历史的洪流中而面目不清、性格漫漶不明。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时间形态中,历史,并不单面地或地展现为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一种冰冷的顺序流动。时间在陶秉坤的生活世界里,被围绕着土地而产生的各种事件所充盈,被陶秉坤夫妻相濡以沫的感情,被他的子孙们形态各异的生命形态所充盈,外部大历史的确会对陶秉坤们的生活构成绝对甚至是致命的影响,但是乡土生活本身所

具有的节奏也从来没有停歇过。《大地芬芳》用最朴拙的方式将乡土生活丰满鲜活地呈现了出来。在小说中,陶秉坤的土地梦,一波三折,甚至不无支离破碎,并不具有象征或隐喻所具有的意义的完整性和突出性,但是恰恰是在这支离破碎中,农民的生命印记处处可见、历历在目,乡土生活被前所未有地聚焦和显现。

二 “告别革命”语境里的革命书写

《大地芬芳》里另一条线索写了20年代风起云涌的革命及其顿挫迂回,以及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与革命遇合交错的各色人等,这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关于革命以及革命者不同人生轨迹的全面详尽书写。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本进入了一个告别革命的年代,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革命万岁的红色逻辑和构思被彻底颠覆和解构,革命不再被看成是追求正义和理想的行为,而更多地和个人的欲望粘连在一起,“革命”在小说中“根本没有正义性、合法性可言,也根本不是沿着进步、进化的轨迹展开,‘革命’成为一群疯狂的农民在欲望的激荡下从事的血腥暴动,国家-民族-阶级解放的革命动力学被改写为个人的私欲动力学。权力和力比多一起成为革命事件的主谋。”^[4]在北村的《长征》中,匪气十足的陶将军之所以向红军投诚,是想借助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说教来报复与地主偷情的老婆;在刘恒的《苍河白日梦》中,二少爷曹光汉参加革命的动力是因为自己的性无能。格非的《大年》中,作为革命引路人的唐济饶为了得到乡绅丁伯高的二姨太政实现自己的性满足而设计了一个“革命”的阴谋:先把仇视丁伯高的乡村二流子豹子引进革命队伍,并诱使他用革命名义杀掉了,然后再以二豹子杀死“开明绅士”的罪名将其铲除掉,最终得到了玫,实现自己的性满足。如果说20世纪50-60年代对革命仅仅只能从阶级斗争解读和演绎,遮蔽了很多鲜活的人性而显得苍白和僵硬,那么90年代以来以解构和颠覆为最终目的的个人私欲动力学支撑下的革命书写,则不免落入了矮化和猥琐化的另一种遮蔽,这种书写无视了历史上很多投身革命的人,他们的确不是为了私欲,而是为了追寻一种理想和信仰而背叛了自己的出身,投入革命的。

《大地芬芳》对革命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的将历史欲望化的写

作方式,但也并没有落入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唯阶级论的偏颇,既不美化也不矮化,而更侧重于讲述革命者们的人生故事,大历史的波澜最终落实到了每个人起伏不定的人生和命运当中,显得分外切实和生动。作家对这沧桑巨变的百年历史,始终充满了人文关怀,写出了大历史背景下不同人物的人生轨迹。这里有起初热情激进,而逐渐厌倦迷茫于党派倾轧、兄弟阋墙、清浊难辨的现实而最终选择从革命、党争中抽身而退的蔡如廉;品性自由不羁到了不端的陶玉林因为陈秀英而短暂地“投靠”了革命,后来又因为陈秀英在党内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反水到了国民党;木讷、拘谨的陶玉田却能够写一笔潇洒遒劲的好字,在热闹的大革命时期,大街小巷贴满了他手书的红绿标语,“表面上看他已经深深卷入革命之中,实际上他与任何事件都无关,就如他写下的那些字,都是些游离于他精神之外的东西”。^[3]¹⁴⁵当然整部小说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坚定忠诚的革命者陈秀英这一形象了,她为了革命背叛了自己的家庭,离开了自己的爱人,甚至接受了以“革命”的名义而来的强奸。尽管这样,她的忠诚性却受到了怀疑。她为了能够继续干革命,不惜更名换姓,甚至用烟灰在自己原本清秀美丽的面孔上烫满了疤痕。这是一个忠诚到了极点的革命者,也是这种忠诚使得她建国后亲手将自己推到了长达三十年的怀疑和审查中,一度沦为阶下囚,并最终在等待审查结果的漫漫无期中精神崩溃而发疯。这几乎是我们始料不及,转而一想又合情合理的命运。“神秘是每一个故事的尺度。通过故事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理的一个特定代理人,故事显示给我们的是人类社会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竞技场,在那里,许多这样的代理人相互接触”。^[5]并没有哪种人生道路在《大地芬芳》中占据绝对主导压倒一切的地位,即便是陈秀英这一形象,作者对她有诸多的偏爱和同情,但也没有完全地认同,各个人物命运的延展,构成了一部鲜活丰富的历史,这恰恰是文学所能够实现的对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切近。

三 坚实的大地及流转的芬芳

中国的20世纪是个充满了变数的时期,失落痛苦焦灼与希望追求的互相缠绕与追逐,构成了这一个世纪丰富异常的色彩与景观。然而反观文学对这一个世纪的描述,我们不无遗憾的发现,在80年代之前,文学对这一段历史的表现是极端意识形

态化的,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尤其是在先锋小说之后,这一段丰富的历史要么被表现为某种观念,如同《白鹿原》曾经试图将这百年的历史写为儒家精神消亡与堕落的过程,要么将历史等同于欲望,如大多数新历史小说一样。然而无论是将历史等同于观念、等同于欲望,亦或是等同于意识形态,都是对历史和人生以及人类命运的删繁就简,远没有写出与这段历史相称的大气沉静的文学作品。《大地芬芳》里抛弃了各种理念的束缚和缠绕,也没有采用过多繁复的技巧,而是以最接近小说原初本质的方式写了一系列很好看的人生故事,而在这些故事的铺陈与展开中,土地与革命,每个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带着他们各自的丰富性甚至是矛盾性,如其所是地存在着,一个坚实的非常富有质感的大地也就在文本中铺展了开来,令人不禁想到了周作人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因为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学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6]《大地芬芳》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土气息”“泥滋味”的作品。

它的土气息、泥滋味不仅仅表现在它从观念上坚持用乡土本位的视角观察笔下的大地,而且作品中还氤氲着浓郁的抒情气息,尤其突出的是小说中出色的风景描写。无论是在古代的诗歌当中,还是在现代文学时期的乡土小说中,风景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片风景就是一片心灵。而进入当代,20世纪50-60年代的农村小说中风景则被当做小资趣味而被扫荡一空,80-90年代以后的乡土小说,从观念出发进行写作的局限性以及作家本身农村生活体验的匮乏,使得风景描写依然缺席。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文学中还是我们外部的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层出不穷的新观念以及目不暇接的各种变化,风景几乎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性。然而风景仅仅作为旅游景点出现,绝对是对人本该拥有的完整生活的一种割裂。小说《大地芬芳》有不少充满了生命感的风景描写:

陶秉坤让她把自己扶到阶基上,贪婪地呼吸着带着炊烟香味的清新晨风。远山正呈现秋天的斑

斓色彩,山坡上得枫叶灼灼火红,野菊花星星点点如细碎阳光洒在田壩上,石蛙溪不紧不慢地流,汨汨作响……扁豆藤爬满了架,挂着串串紫花,鸡在刨食,猪在阴沟里拱泥,竹篙上挂满红辣椒……这一切又多么好。^{[3] 234}

他喜欢倾听着山谷里的声音,喜欢从风里嗅着四季的气息与日子的味道。凭着泥土的温热,他晓得开春了,要犁田了;而紫云英的淡香则告诉他要准备插秧了;稻花的香味令人五脏清爽,红透的枫叶与收回的红薯则会送来类似米酒的醇香,令他深深地沉醉。^{[3] 500}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曾经有过一个说法,“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接在一起的。……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7]《大地芬芳》正是小说作者背离了潮流性的写作方式而成就的一部大作品,那穿插着无数气味、声音、颜色、物象的风景,以及这风景中蕴含的饱满的生命气息和宁静的动感,构成了坚实大地上流转不息的芬芳,整部小说具有了一种既厚重又灵动的奇妙韵味,掩卷之后,依然令人回味无穷。

参考文献:

- [1] 贺仲明.论中国乡土小说的二重叙述困境[J].浙江学刊,2005(4):115-122.
- [2] 郇元宝.论阎连科的“世界”[J].文学评论.2001(1):42-51.
- [3] 陶少鸿.大地芬芳[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 [4] 陶东风.论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J].当代文坛,2008(1):7-13.
- [5] 哈维尔.故事与极权主义·哈维尔文集[DB/OL].(2003-11-18).<http://www.hcclib.net/online/76/index.htm>.
- [6]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M]//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303.
- [7]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16.

责任编辑:黄声波